

多希望你拿到这份报纸，打开这个版面，看到这几篇文章时，天是蓝的，而且是那种难得的，久违的，透明的蓝，这样的天做什么都好。

这样的天会像一把钥匙，把我们混沌郁结的心境一下子打开。

好的作品也像一把钥匙。它打开我们对语言的感觉。有人说，你只有一个版面，想做到雅俗共赏是不可能的，说不定还会陷入两难，雅的不屑看，俗的看不懂。哈，我可不那么认为，行走人世间，表面富士康，内心乌托邦，或者反之，比比皆是。那些所谓大词、成语、雅文、自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力量，然而简洁、直接，没有任何修饰的俚语也可能一语中的。

“正如每个喜欢抖腿的人心里都装了台缝纫机，每个热爱高跟鞋的女人心里大概都有一支踩高跷而来的秧歌队。”

“此时夕阳已淡下来，天色更蓝，一枝红柿斜伸，几片霜叶，二三小鸟，构成了一幅简洁的彩墨文人画，很有宋人气韵。”

不同的表达，你更喜欢哪一种？

好的作品，会打开我们的智力，获得一种智慧上的亮光，寻找到着世界的另一种哲学眼光，它可能是你以前没有触碰到的，没有想到过的，若没有这部作品，可能以后也不会想到。

好的作品还会打开我们的眼界。出门游历让我们获得第一手经验。然而现代人大大都惧怕陌生，阅读好的作品却可以使我们不出门便拥有二手经验。而且是被消化被提炼的经验。你也许注意到了，我很少发游记，不是有什么偏见，而是有一种游记，类

似旅游攻略或景点解说词，根本无法打动我，更不要说让眼前一亮。

我只心仪这样的游记。它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，有探索的欲望，但不古板。借由个人的旅行来完成历史的，知识的，个人身份的探讨。我甚至推崇那种没有目的性的游走，放弃既有的熟悉的框架，你的身份，你的职业，你的喜好，去拥抱陌生，陌生的食物，陌生的场景，陌生的人，在这种陌生中重新确认自我。

不但如此，好的作品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，一向对戏曲不感冒的我，读完《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戏》，只想赶紧把魏新在文中提到的那几出戏的戏词找来看看。

好的作品也打开想像的世界，使我们获得一种更新。吃饭睡觉，完成生理上的更新，阅读好的作品，是完成精神上的一种更新。

散文、小说、评论，甚至新闻报道，有哪一样不需要想像，即使是采访的大量材料，难道不需要想像，它们怎样的排列组合，取舍剪裁以获得最佳效果。

想像，是脑海里腾空而起的烟火，那一瞬间的爆发照亮周围，形状，颜色，气味，纤毫毕现。

发挥一下想像力吧。若这个世界真是上帝创造的，他创造了季节，春夏秋冬，各有千秋，他创造了人类，人情世故，包罗万象，而我们，借由文字，纸，笔，记录下回忆，想像，思索，批评，会创造出另一个世界。

编辑手记

小说世情

小媳妇之死

□ 王学胜

堂弟来我家，喝茶饮酒中说起一个小媳妇死了。小媳妇是我们村的一个老妇人，小时候母亲就给我讲过她的多舛命运。

大概七十多年前，也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，村里一户人家种有一片瓜地。正值盛夏时节，傍晚暑气渐去，瓜棚下的席子上，孩子们滚爬嬉闹着。远处的小路上走来几个人影，走近看清了，是一对年轻夫妻模样的男女抱着一个小女孩。

听口音他们是外地人，看样子是过路的，背着大包小包。与瓜地女人打过招呼后，他们就在瓜棚下歇息，还拿出饼干糕点分给孩子们。瓜地女人从地里摘下熟透的瓜，他们一起吃着、聊着。那个男人不时向瓜地女人打听村子里以及周围的一些情况，他了解到，这片瓜地离村子很远，夜里非常幽静，鸡犬之声都很少听到。并且知道，瓜地男人有事出门，今夜不回来了。天黑下来，那对男女提出要在这里过夜。瓜地女人连声说这怎么行，只有一间看瓜的小屋，几个孩子就几挤满了炕头，劝他们到村子里去投宿。他俩说，这天气，在瓜棚下就可以很好地过一夜。见他们坚持，又很和气友善，瓜地女人也就答应了。

夜渐渐深了，瓜棚下的孩子已经横七竖八在席子上睡熟了，瓜地女人抱幼孩长，把他们弄到屋内炕上。过路女人怀中的女孩也早已甜甜入睡，她将孩子轻轻放到席子上，盖上衣衣服。瓜地女人看到，那个男人见他的女人头枕着包袱，就从地旁搬来一块石头，盖上一块毛巾，代替了包袱，让女人枕着巾。

夜深了，死寂笼罩着一切。突然，一阵沉闷的窒息声的声响在黑夜里弥漫开，瓜地女人在睡梦中被惊醒了。定一定神，她赶紧爬起来趴在小屋的窗口向外张望。月光里瓜棚下发生的一幕让她惊呆了：只见那留宿的男人高高举起一块大石头，朝席子上沉睡中女人的头部狠狠砸去。据瓜地女人后来回忆，那惨状就像一只用力扑腾着翅膀的大公鸡猛然间被一刀刺去了头，血流喷射，身躯拼命挣扎着，喘着最后的气。看到这样，瓜地女人不禁大喊：“大哥，你怎么砸露子呢？”那男人面目狰狞、眼露凶光，吼道：“住口！你要是再喊，我连你也砸在这里！”

地上头部被砸烂的女人声息渐渐细微了，慢慢地只冒冒着血气。那男人叫屋内的女人开门，此时瓜地女人早已吓得毫无意识了，她打开了门。那男人抱

微语绸缪

正如每个喜欢抖腿的人心里都装了台缝纫机，每个热爱高跟鞋的女人心里大概都有一支踩高跷而来的秧歌队。无论你在南方露着腰还是在东北穿着貂，高跟鞋从高跷继承而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，它改变了女性与世界对视的维度，成为人类“站得高看得远”充满自信的一个支撑点。

在很多男性眼里，穿高跟鞋的女性更迷人。有研究者以实验数据证明，高跟鞋使步伐“变得小而频繁，同时伴随扭动的腰肢和翘臀”，“姿态更具有女性步伐的特质”——等等，这事儿还需要实验？如果把那双著名的水晶高跟鞋换成阿迪白球鞋或者喜儿的黑布鞋，哪个王子还费劲去找能穿它的灰姑娘？

作家杨杨写过：“女人穿高跟鞋，风度翩翩，走起路来噔噔噔作响，能把臭男人的心都要敲碎。”“高跟鞋已成为不可抗拒之物，纵是义和团诸同志在坟墓里揭竿而起，都没有用。”他还就高跟鞋对女性身体姿态的塑造进行了生动描述，我就不引用了。男人的赞美一旦从原则性歌

流年碎笔

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，令人振奋。此时，我想起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在大陆力推计划生育政策的马寅初，另一个则是冒死进谏蒋介石力求在台湾实行节育的蒋梦麟。

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普查，截止到当年6月30日，中国大陆总人口是6亿多，增殖率为20%，每年要增加人口1300万左右。这次普查结果令毛泽东非常兴奋，为此写下了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的著名诗句。但这次普查结果也引起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关注，他认为这次普查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，有以偏概全的缺点，而且增殖率也不止20%，应该还高。于是，他开始调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，首先是增殖率远高于20%，平均在22%以上，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30%。如此下去，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26亿。不算不知道，这一算着实把马寅初吓了一跳，到那时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。于是，马寅初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《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》一文，作为在1955年7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，交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。此文散发，立即引来争议，反对者居多，甚至有人套上马尔萨斯人口论，对此进行批评。马寅初一看不妙，立即收回，静待时机成熟再说。当年9月，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“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”。

虽说人命关天，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一个丝毫不知底细过路女人的死，如何破案呢？最后，只好官罚出点钱，好心的村民们将那可怜的、梦中惨死的女人，用芦苇裹一下，连同那块沾满她血浆的石头一起草草埋掉了。那小女孩自然就成了孤儿，被村里一家没有女儿的人家领养。那家女主人很厉害，白吃饭怎么样？稍稍长大后，就让小女孩干繁重的活，还吃不好，再大一些，就不肯养活她了，将她送到我们村当了童养媳。因为她身材矮小黑瘦，也不清楚她正式的名字，村里人就叫她“小媳妇”。

小媳妇嫁的男人又老又丑还酗酒，经常打骂她。别的女人还有个娘家可以走动，诉苦、求助，小媳妇举目无亲，挨了丈夫的打骂，只有独自暗地垂泪。周围人们都可怜她：唉，多苦命的人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再受累再受苦日子也得过，小媳妇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岁月。一年又一年，终于，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了家，丈夫也老了，脾气也好多了，不再打骂她。人们说，小媳妇熬出头了。

那一年快过年了，小媳妇的老头子在一个工地上看家，年底让一个儿子捎回来一点工钱。可这个儿子并没有把钱给他母亲，而是自己花了。小媳妇知道后也没有在意，另一个儿子也没怎么样，可是没得到钱的那个儿媳妇却很不满，一样的儿子，为什么单独给一个钱？再说了，暗地里老两口还不知道给那个儿子多少钱呢。于是，家庭中就增多了婆媳纠纷，空气中充斥着杂音。小媳妇饱受岁月伤害、虚弱的心再也无力承受了，受尽生活屈辱的她最终厌倦了人世，在一个寒冷的深夜，梁尘自尽了。
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可那个瓜棚下残忍杀死自己女人的男人，有谁知道可曾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？

堂弟说，小媳妇出丧时，寒空中飘着冷雨，许多了解她遭遇的人都流下了眼泪。

微语绸缪

想起了马寅初和蒋梦麟

许志杰

在蒋梦麟不屈不挠的抗争之下，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轰轰烈烈的节育运动，终于迫使台湾当局低头“认错”。1964年6月19日，蒋梦麟因病在北台逝世，也就是这一年台湾当局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工作，并提出“实施家庭计划，促进家庭幸福”的口号。三年后的1967年，台湾当局进一步对婚育节育进行规范，提出了一个叫做“五三”的口号。这“五三”是：希望民众结婚后三年才生育，间隔三年再生育，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，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。1969年再次提出“子女少、幸福多”的口号。到了1971年，台湾当局决策层开始意识到节育的重要性，指定每年11月为台湾“家庭计划”扩大倡导月，提出“两个孩子恰恰好，男孩女孩一样好”口号。

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戏

魏新

曹大嫂就按河南人的口味给关羽做饭，山东人爱吃煎饼卷大葱，吕剧《下陈州》中，娘俩就给包大人准备：“听说那老包要出京，坏坏了东宫和西宫。东宫娘娘烙大饼，西宫娘娘剥大葱。”包大人再忙，也要吃了这口才能上路。

我老家在山东曹县，豫剧和河南坠子深深地影响了那个县城的人们。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和崔兰田都是曹县人。我小时候，经常看到豫剧的演出，有时是在县剧院，有时就是在农贸市场的露天戏台，虽然看不太懂，但也看得出来。记得有一年马金凤回乡演出，唱《穆桂英挂帅》，“辕门外三声炮”一起，观众就炸了，那嗓子，那调门，比真开炮还震人。

比豫剧炮，坠子更要通俗一些。如今唱坠子最有名的，要数郭永章，绰号郭瞎子，也是鲁西南人，他唱坠子时自己拉坠胡伴奏，脚打梆子，唱腔亢亢酣畅，声情并茂，乡音如醉。郭瞎子的代表作有《罗成算卦》《吹牛》等。顾长卫导演的电影《最爱》中，就用郭瞎子唱了一段《吹牛》：“好田地我有八百顷，好房子我有八百间，我喂着八百骡子还有八百马，还喂了八百老板尖，还喂了八百拉磨驴，磨了白面大家餐。老

郭天王不懂鞋

□ 白瑞雪

总让人想起辜鸿铭老先生或李渔老师研究三寸金莲时的学术投入，常伴不舒适。

不过，这两件足下事还真不可分。现代意义上的高跟鞋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传入上海滩时，有人把从缠足到高跟鞋的时代巨变当作女性解放标志，也有人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之瘾还未戒除，不过是以“西洋的高跟鞋子来代替”。

想！多！了！美则美矣，哪要那么多灵魂，或枷锁。

回到女性视角，出门总少一双的高跟鞋，是幼年张爱玲发誓长到10岁必须拥有的财产，是“压裙子”一瞬暴露脚下的Ferragamo，是离不开纽约的Carrie存了一柜子的Manolo Blahnik，是喝醉了酒的千颂伊拿来敲都教授门的那双Jimmy Choo。女人的高跟鞋既是语义世界里一类指称意义的概括，也是物质世界中某个具体的一对。

话剧《空中花园谋杀案》的男一号告白说：“你依然美艳动人不可方物，就像爱国主义电影里的女特务。”有部神剧将

想起了马寅初和蒋梦麟

□ 许志杰



育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。

其实，就在马寅初的《新人口论》受到狂批的同时，海峡彼岸的台湾也正在进行一场波澜壮阔的“计生”大争论，挑起者也是出自北大，一位曾经三度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、校长长达17年的蒋梦麟。

1946年台湾地区总人口是609万，1949年增长为740万，到1956年10月常住人口就达到了930万。

台湾人口急剧膨胀引起时任“农村复兴委员会”主任委员蒋梦麟的忧虑，1959年，蒋梦麟发表了一篇震惊全台的文章《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》。蒋梦麟直面台湾地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，疾呼：“唯有推行家庭计划，进行节育运动，才是解决之道。”当时，海峡两岸还时常发生枪炮战，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参军参战，节育会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，直接影响兵源。蒋梦麟的节育主张，被视为“动摇根本”，是“共产党同路人”。面对汹涌的攻击，蒋梦麟依然我行我素，他说：“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闹下乱子，那我宁愿当局来杀我的头。那样太多的人口中，至少可以减少我一个。”

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戏

□ 魏新

生的《以戏代药》上，记录一段河南曲子，风格就完全不同，曹操是这么唱的：“在曹营我待你曹那样不好？顿顿饭四个碟两个火烧。绿豆面拌疙瘩你嫌不好，厨房里忙坏了你曹大嫂！”还有一个版本，细节更生动：“在许都我待你哪儿不好，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。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，大冷天只忙得热汗不消。白面馒头腊肉你吃腻了，又给你煮一锅马肉菜包。搬蒜臼还把蒜汁捣，萝卜丝拌香油调了一瓢。我对你一片心苍天可表，有半点耍主意我是眉毛！”

这就是地方戏的表现力。对老百姓来说，寿亭侯和赏赐都是虚的，不吸引人，但曹大嫂亲自下厨，七个碟子八大碗往外端，又是捣蒜泥，又是倒香油，这么多好吃的伺候着，那曹操对关羽多讲究啊，甚至还脸红脖子粗，赌咒发誓，如此可见，关羽还非要回去找他大哥，可这见二爷对刘备的忠心耿耿。

京剧是国剧，由于徽班进京，相当于一个大重组，加上欣赏京剧的人里，不乏皇亲国戚，达官贵人，自然在创作和表演上要求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地方戏的观众群体就是老百姓，各地的老百姓有各地不同的风俗民情，所以地方戏的地方特点尤其突出。河南人当年爱吃绿

这一经典形象发扬光大，让抗战女特工穿上了一众极细的高跟鞋——那些美丽的高跟鞋里藏着利刃之类的武器，腿起头落！与很久以前江湖上的如影随形腿、连环迷踪腿、旋风扫叶腿等纯以格斗技巧取胜的下肢作战方式相比，武器装备——即使只是冷兵器的加入，在杀伤效益上实现了质的提升。

然而，这里头有一个大bug。根据全球时尚史记载，直到二战后经济复苏，在钢钉技术的推动下，尖头、细高才取代此前的傻大厚粗而成为高跟鞋界主流。杨柳也提到过这段历史：“抗战时，中国流行穿满高跟之鞋，那是从巴黎传来的样式，早已落伍，因海运被日本切断，洋风吹不进来，所以一直保持了八年之久。等到抗战胜利，一看细跟的早已出笼，不禁心急，慌忙赶上……”

综上所述，细高跟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之一，是和平给予我们的奢侈。此后半个多个纪里再未发生过世界性大战的地球上，女人的鞋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脱离行走功能，千奇百怪得让

我们几乎忘记“为什么出发”——几个世纪前，为了方便农夫在松软土地中耕作，为了把人们宝贵的鞋子与满大街的泥泞、马粪隔离开来，我们的先辈发明了：高跟鞋。

即使痛苦前行，高跟之上的我们仍然是快乐的。

半辈子恋情遮遮掩掩的香港老师哥郭富城，最近罕见地公开了年龄小自己几十岁的嫩模女友，引来人民群众哗然一片。他曾这样解释与前任分手原因：“好像对鞋子不适合，脚经常不舒服，你也会想换一对舒服的鞋。我们每天都要走路，就好像身边的伴侣，应该找对合适的才穿上去，起码不会伤到自己，硬着来只会流血，伤口又不能愈合，找另外一对可能更好，感情世界也是这样。”

“不喜欢了”四字绕过一个如此复杂的比喻，可见其偶像包袱之重。郭天王不懂的是，舒适度并非检验鞋子的唯一标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美丽高跟鞋这个东西就像核武器，拥有即最大意义。

非常文青

观柿图

□ 牛余和

树上的柿子早已摘过，赭红色的叶片也所剩无多。窗外的柿子树只有顶梢上还举着两颗柿子，一颗背向我，干结的柿柄像枚锈蚀了的青铜扣件，很精致又极轻巧地扣住了它。一颗面朝着我，橙黄色肚肤薄得透亮，映出里面鲜红的果肉，很诱人的样子。

夕阳在薄薄的晚风中温和而且舒展，抹在红的屋瓦和蓝的天空之间，树梢越过屋脊，越过夕阳，伸展向蓝天，两颗柿子也越过屋脊越过夕阳，在明丽的淡蓝中摇晃。

三只小鸟飞过来。准确地说是一只麻雀和一只叫不上名字的蓝下颌小鸟，它们站在树梢上叽叽喳喳的，斜睨着两颗柿子，垂涎欲滴的样子。我挥手吓跑了它们。我也觊觎这两颗柿子好几天了，岂能让它们争食。

在窗前种这棵柿子树，原是为了到冬天欣赏雪白柿红的图景的。初雪覆盖柿子的景象的确很赏心悦目，特别是在北方萧瑟的冬季。但每每好景不长，柿子很快就被无处觅食的鸟儿啄食一空，剩下半树暗红残骸一地乌黑鸟粪，留得红柿衬白雪的浪漫设想也因此屡屡遭人嘲笑。从去年开始便无奈由浪漫转向现实，霜降前就把能够摘得到的柿子采摘下来，不再等待飘雪时节看红柿。由此也悟得所谓浪漫情怀，须是天上牵着地下扯着方能摇曳出一派绚丽，离开现实，浪漫只会流于空幻。不想由这一悟却得到了另一番景致。

那三只小鸟又穿过晚霞落回树梢，充满警惕抑或是满怀乞求地打量着我。特别是蓝下颌，转着圆溜溜的眼睛，低头看看瓜下的柿子，抬头看看我。我站着不动。它们先是试探着啄一下柿子，马上忐忑地盯我一眼，随即叽叽喳喳啄食起来。此时夕阳已淡下来，天色更蓝，一枝红柿斜伸几片霜叶，二三小鸟，构成了一幅简洁的彩墨文人画，真好，真灵动，很有宋人气韵。

婆子我有八百六，好儿孙我有一万三。”电影中，郭富城和章子怡也跟着唱：“我本是老天爷的他干爹，你看我体面也不体面。”

我最爱听曲剧《卷席筒》，其中海连池有一名段，如泣如诉：“小苍娃我喂了登封小县，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熬煎……小金哥和玉儿难得相见，叔侄们再不能一块去玩；再不能中岳庙里把戏看，再不能少林寺里看打拳；再不能摘酸枣把黑山上，更不能摸螃蟹到黑龙潭……”四个“再不能”承载的美好回忆，一个比一个心酸，让伤感排比而来。

地方戏深深影响了一个又一个地方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，是繁华还是偏僻，只要有锣鼓点响起，就有诱人的动静，吸引着一群又一群终日劳碌的人，成为他们在遥控器到手之前最好的精神寄托。

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宝玉在太虚幻境，警幻仙子说，“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，必有生旦净末之则，又有南北九宫之限。”既然如此，尘世中的人，大概也只能在南北九宫里，或生或旦，或净或末再或丑吧，除此之外，想要超脱，只能是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命运终究还是在戏里。